

導言：重探臺灣電視史

柯裕棻*

2022 是臺灣成立電視事業的六十週年。早期的電視產業狀況除了諸多研究一再覆述的電視與威權結構的關係之外，事實上電視在臺灣的前七年、前十年之間就有非常大的差別，而 1970 年代後半到 1980 年代又面對完全不同的技術、產業和文化形態。許多文化史的分期常以十年為一區間，因此六十或一百這樣的整數自然成為非常具有象徵意味的時間區段。然而，整數的「週年」概念也許方便斷代與分類，但僅僅是年份數字的巧合美觀並不足以作為事件分斷或延續的解釋。過於依賴年份數字的符號差異將使我們忽視促成事件湧現（*emergence*）的決定條件，不假思索地以世代標籤來歸類行動主體的網絡關係，更可能選擇性地無視另一些功敗垂成的重要線索（*Foucault, 1977*）。

二戰後美國的軍事部署和經濟援助深入各國，形成新的地緣政治。這影響的不只是國際政治與依賴經濟，這段時期許多民族國家爭相投入以美國價值為首的現代化競爭，在生產的物質基礎、專業知識型態、大眾文化型構和日常生活方式上，都發生系統性的改變。傳播技術與行為主義科學結合，形成主導各國現代化思維的發展理論。電視是當時最新的傳播科技，因此成為現代化的指標之一。綜觀東亞諸國的電視事業，從設置到普及化的過程都與美國文化冷戰、跨國資本流動、國家主導的經濟建設計劃有極深的關係（*Simpson, 1994; Cumings, 1999; Shah, 2011; Looney, 2021*）。

我國的電視事業概念發端於 1950 年代，過程頗為曲折。1953 年曾虛白受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考察電視事業，卻籌劃無果（曾虛白，1977，頁 186），直到 1962 年教育電視臺和臺灣電視臺（台視）才相繼開播。這九年間，臺灣的電視事業受國際情勢牽動和政治內鬥影響，數度擱置。最後終於由教育部積極促成的教育電視臺最早開播。初始教育電視臺的覆蓋範圍僅臺北市部分地區，且影像不清，節目內容簡單，影響力有限，因此在電視史研究中經常被忽略。然而作為當

* 柯裕棻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yfko@nccu.edu.tw。

時亟欲展現民族尊嚴的科技象徵，以及承繼多位行動者對公共利益的厚望，教育電視臺的意義十分重大。本期專題中，程宗明的論文重整了我國電視史的開端：〈臺灣電視歷史發展的新眼光：論教育電視作為一種批判戰後臺灣民主工具化的印證〉探討 1950-1960 年代我國教育電視臺的設置、理想之幻滅與沒落。程宗明從公文檔案中整理出關鍵行動者的關係網絡、美援計畫項目如何迂迴運用、以及國民黨留美系統的派系之爭。將這些置於蔣介石政權人事佈局與言論緊縮的暗湧之中，可以看見教育電視臺的三位主導者前後接續、多方串連並秘密籌劃的過程。其中，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的成立也是非常重要的條件，這使得教育電視臺能夠以推動我國電機工程發展的立場順利進行，因而迴避了敏感的政商利益之爭。程宗明重新發掘 1950 年代行動者們的理念和實踐，將教育電視臺定位為承載自由主義與專業規範的電視臺。然而在國民黨的形式主義與侍從政治之下，教育電視臺開播後旋即沒落成殘補角色，最後為中華電視臺（華視）合併。程宗明也從全球公共電視的系譜中反思教育電視臺的時空條件侷限與失敗的原因。

1962 年台視成立之際，臺語是我國大多數的語言，因此電視的播送語言比例始終是國民黨文化治理的關鍵問題。我國的廣播電視語言管制政策在過去六十年來幾度調整，初始沿用廣播規定，自 1970 年代之後趨嚴，「方言」逐步被限縮並邊緣化。蘇致亨的研究〈重新分期臺語電視史：黨國資本主義、強人的沈默和蔣經國時期的雙面本土化〉首先整理了三家電視臺從 1962、1969、1971 開播至今的臺語節目播出時間比例，以及三臺每週臺語電視節目平均時數。這些資料原本十分龐雜散亂，本篇研究詳細計算並製表，整體呈現了過去六十年的變動曲線。蘇致亨也翻查了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廣播安全會報和各部會的公文檔案，積極與蘇蘅在 1993 年發表的經典研究對話，並呼應近年臺灣史研究對於文化治理的論點。他將廣電語言政策重新分為六期：舊慣沿襲期（1962-1969）、初步管制期（1969-1971）、嚴格緊縮期（1972-1973）、雙面管制期（1973-1984）、限縮發展期（1984-1993）、鬆動期（1993 至今）。這個極有創見的分期方式指出，此前的本土化研究以國家為中心的「強國家」論述在實際資料中難以成立。70 與 80 年代的蔣經國時期實際上並非「本土化」的年代，這個時期的政治文化在虛實、領域和階級上有非常顯著

的「雙面性」。蘇致亨提出從「黨國文化治理」來思考電視史研究，有三組課題值得繼續探討：一是黨國資本主義的媒體政治經濟學，這部分始終是傳播學者長期努力的方向；二是強人領袖對語言管制議題不尋常的沈默；三是蔣經國時期的公開展演與黨政實際作為的差異。後兩組課題需要未來的政策研究重整問題意識，以不同的提問重新深入檔案。

魏玠的〈重訪豬哥亮歌廳秀：1980年代臺灣電視娛樂文化政治的再檢視〉以1980年代盛極一時的《豬哥亮歌廳秀》錄影帶為切入點，探討臺灣電視娛樂內容的生產、流通、和政治脈絡，並對50集的《豬哥亮歌廳秀》作文本分析。魏玠先指出19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電視臺競爭激烈，節目娛樂化，然而蔣經國政權對電視節目內容強力干預，進行道德管控，這構成相當矛盾的文化政治。與此同時，錄影帶和有線電視（「第四台」）的出現也給影視消費市場帶來不同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在魏玠的分析中看見歌廳、錄影帶與「第四台」、無線電視臺等不同場域構成1980年代的通俗文化景觀。魏玠認為，新興另類媒體如錄影帶與「第四台」的崛起得力於《豬哥亮歌廳秀》為首的娛樂內容，而豬哥亮的表演內容也受制於新興媒體的運作邏輯。文本分析以豬哥亮和來賓表演的語言政治為主，另外分三個文化政治面向討論意義的鬥爭：省籍／族群政治、性／別政治、電視文化政治。魏玠認為《豬哥亮歌廳秀》在語言與文化控管緊張的時代，是一種被壓抑的重返，一方面突破語言、省籍和性慾的表現限制，但也無法挑戰結構、甚至反而強化了這些對立關係。

電視廣散地深入日常生活，它使微觀的個體和鉅觀的結構持續且密切地交互影響。電視也鑲嵌在家庭空間中，它的訊息多音多義，影像流動而紛亂，這種特性使得電視涉及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面向特別多重複雜。面對此種複雜，本專題論文的研究取徑都不相同。程宗明從行動者的關係網絡和實踐歷程重探一段幾乎湮滅的建臺史，蘇致亨從卷帙浩繁的檔案研究中大幅重整了廣電語言政策的歷史結構，魏玠以社會脈絡與文本分析重新檢視通俗文化的意義鬥爭之可能與不可能。他們分別剖析了電視科技在臺灣社會如何受全球冷戰結構牽動，強人政治如何運作於法規制度的背面，以及位於法外之地的底層通俗文化現象意味著什麼。歷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幾乎能決定資料顯現的事實面貌，而電視史的研究更是需從大量的斷簡殘編中回溯、重組、拼湊事

實。本期的專題論文重新將關於電視的結構、政策與文化問題複雜化，提出超越單一因素決定論的解釋，因而從新的問題中開闢出不同的視野和理解。

參考書目

- 曾虛白 (1977)。《美遊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蘇蘅 (1993)。〈語言 (國/方) 政策型態〉，鄭瑞城、王振寰、林子儀、劉靜怡、蘇蘅、瞿海源、……李金銓編《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頁 217-278。臺北：澄社。
- Cumings, B. (1999).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77).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D. F. Bouchard (Ed.),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pp. 139-16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ooney, K. E. (2021). *Mobilizing for development: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hah, H. (2011).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ization: Daniel Lerner, mass media, an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impson, C. (1994).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